

# 冷战后东南亚的民族分离主义运动

## ——以印度尼西亚为例

李一平\*

**【内容提要】**自 20 世纪 90 年代末以来,东南亚的民族分离主义运动不断发展,尤以印度尼西亚为典型。这种发展有着复杂的原因,其中最根本的还在于不同地区和不同民族之间在“中心”与“边缘”关系上存在着巨大的社会经济差异与不均衡性。因此,减少这种不均衡性,将有助于解决印尼乃至整个东南亚地区的民族分离主义问题。

伊奥内斯库认为,过去四五十年中,人类社会进入一个相互依存的新纪元;这个纪元体现着“20 世纪中叶出现的科学信息革命对人们在国内国际事务方面的行为的影响,这场革命将这些事务紧紧地联系在一起,通过协调作用,它们形成一体又高于并不同于全体相加的总和”<sup>①</sup>。这是一种“相互依存”(interdependence)的思想。作为这一思想的实践,1991 年 12 月,西欧国家在荷兰签订了《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为欧洲的“统一”制订了时间表。2002 年 1 月 1 日,在欧盟范围内,统一的货币——欧元正式开始流通。西欧的联合为迷茫中的世界提供了希望。

然而,与此同时,伴随着苏联的解体,在发展中国家,民族主义正在卷土重来:东欧的民族问题日趋恶化,东南亚的民族分离主义运动也在不断发展。“原先对立的两大阵营土崩瓦解,不仅是发达国家失去了明确的敌人,

在广大发展中国家,也因为对抗张力的消失而使曾经居于主导的政治意识形态衰微败落,导致了文化价值的缺位,民众迫切需要新的思想统帅和生活意义的寄托”<sup>②</sup>。如何看待这种截然不同的政治现象?我们试图以印度尼西亚为例,分析冷战后东南亚的民族分离主义运动,从一个侧面加深对这一现象的认识。

### 印度尼西亚民族分离主义运动的发展

弥尔顿说,民族分离指民族国家内的非

\* 厦门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副教授。

① Ghita Ionescu, *Leadership in an Interdependent World: the Statesmanship of Adenauer, De Gaulle, Thatcher, Reagan and Gorbachev*, London, 1991, p. 5.

② 李永刚:《当代发展中国家的民族主义》,载《社会科学》1999 年第 12 期。

主体民族为了在己方成员所居住的区域取得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有效控制权,采取现行政治体制所允许的公民抗议或者是非法的武装反抗方式,来达到从国家政治中心获得自治的目的,其形式可以是联邦、半联邦、分离和独立<sup>①</sup>。

以印度尼西亚为代表的东南亚的民族分离主义运动,主要是多民族国家内部的非主体民族为谋求自治或建立独立的主权国家而展开的。

1998年5月,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哈托被迫下台,国内民族分离主义分离倾向加剧。

1999年8月30日,在联合国主持下,东帝汶举行全民公决,78.3%的选民支持东帝汶独立。同年10月19日,印尼国家最高权力机构——人民协商会议批准东帝汶全民公决的结果,正式取消人协1978年颁布的规定东帝汶为印尼的第27个省的法令。2002年5月19日午夜,东帝汶正式宣布独立,成为世界上最年轻的国家。

印尼苏门答腊岛西北部的亚齐也在为争取民族自治而努力奋斗。从荷属东印度殖民统治建立开始,亚齐的抵抗运动就从未停止过。1908年,荷兰殖民主义者经过35年的殖民战争,才征服了亚齐。在荷属东印度时期,亚齐人民继续揭竿而起,抗击白人殖民者,是印度尼西亚的创立者之一。印尼独立后,亚齐希望成为一个自治省,用伊斯兰教的宗教法作为亚齐省的法律,但是1950年,亚齐却被并入北苏门答腊省,引起了亚齐人的不满。

1953年,在达乌德·贝鲁的领导下,亚齐人联合其他几个省份反对苏加诺政权,发起了武装起义,宣布在亚齐不存在潘查希拉政府,亚齐是伊斯兰教国的组成部分。1956年,苏加诺被迫做出让步,宣布亚齐享有“特殊地位”,并允许实行伊斯兰教法,但亚齐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苏哈托上台后,亚齐与中央政

府的矛盾再度激化,亚齐要求通过全民公决实行独立的呼声又一次响起。1976年在哈桑·蒂罗的领导下,亚齐分离主义武装“自由亚齐运动”宣布亚齐“独立”,建立“亚齐伊斯兰教国”,苏哈托政府派出军队,迅速平息了叛乱,“自由亚齐运动”转入地下。

苏哈托下台后,亚齐的分离主义情绪日益高涨,与中央政府的矛盾日益尖锐,政府派军队镇压。亚齐宗教领袖东姑·班达莫亚赫及其50名追随者被包围杀害,3000多平民死亡或失踪。血腥的暴力更激起亚齐人民和“自由亚齐运动”领导人争取亚齐独立的强烈愿望。他们认为“自由亚齐运动”不为亚齐自治而战,也不为联邦而战,是为亚齐独立而战。

雅加达政府认为,一旦亚齐公决独立,印尼将面临分崩离析的危险,诱发外岛省份要求独立的骨牌效应,同时,由于亚齐地处海上交通要道——马六甲海峡,有关国家不愿现有地缘政治、经济格局被打破并进行重新分配。因此,1999年瓦希德当选总统后公开表示,亚齐问题的全民公决只是有关推行伊斯兰法令的问题,不涉及到自治或独立的议题。

此外,在印度尼西亚最东端的西伊里安查亚省,原住民也在要求独立。在马鲁古地区,基督教徒与伊斯兰教徒因宗教矛盾而引发的冲突,自1999年10月开始至今没有停止。伊斯兰教极端分子号召对马鲁古进行“圣战”,要夺回基督教占领的地盘,并派人员和运送武器到安汶和马鲁古地区<sup>②</sup>。而在三发地区,达拉克人与作为外来爪哇移民的马都拉人也在发生大规模流血冲突。马都拉人是外来移民,到当地后经济地位上升,垄断了商

<sup>①</sup> Milton J. Esman, "Two Dimensions of Ethnic Politics",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vol. 8, No. 3, July 1985.

<sup>②</sup> [印尼]《传教媒体月刊》,雅加达,1999年第12期。

业、运输、交通与捕鱼等行业,引起原住民的不满,加上种族主义等势力的挑拨,造成多次的民族冲突。外岛居民纷纷要求更大程度的民族自治。

考察印度尼西亚的民族分离主义运动,我们发现它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民族问题与宗教冲突交织于一体,宗教信仰为民族分离主义提供思想与政治资源。在印度尼西亚的民族分离主义运动中,宗教,主要是伊斯兰教正越来越多地被加以引入,成为策动民族分离运动和争取民众支持的手段。伊斯兰教的生命力是通过穆斯林的社会行为和政治行为体现的。不同教派之间、不同社会集团之间、不同教派与不同社会集团之间、不同教派与政府之间的政治关系以及不同教派执政领导国家时的内外表现均构成这些行为体现。现代伊斯兰主义尤其强调对政治的参与,它给不同国家、地区与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及变化中的国际关系带来冲击,常常使民族问题演变成国际问题。

二是民族分离主义运动中暴力与恐怖主义活动频繁出现。在印度尼西亚和东南亚地区的其他国家,民族分离主义武装在与中央政权的对抗中,力量始终处于劣势,同时受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和其他宗教极端势力的刺激和影响,经常借助暴力与恐怖主义手段来达到其政治目的。在印度尼西亚,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和伊斯兰极端势力主要是伊斯兰政党中的极端分子和一些小党,人数不多,但能量大,组织严密,战斗力强。他们与民族分离主义势力勾结在一起,到处挑拨离间,鼓吹向异教徒进行“圣战”。在中东和中亚地区恐怖主义活动影响下,印尼和东南亚地区的恐怖主义势力也在形成与发展之中,并正日益引起当地政府和世界的关注与警惕。

## 影响印度尼西亚民族分离主义运动的因素

(一)历史背景:殖民主义历史的遗产。

历史上,东南亚地区曾长期遭受殖民主义的统治。自欧洲殖民者东来以后,东南亚的许多地区先后沦为殖民地。在西方殖民者施行殖民统治的政策中,“以夷制夷”和“分而治之”是其经典做法,这加剧了该地区的民族隔阂、仇视和宗教冲突,为民族分离主义运动准备了条件。荷兰人在苏门答腊的亚齐推行“以夷制夷”的政策,亚齐社会的世俗领袖“乌略巴朗”缓慢地同荷兰人妥协了,从而在他们和亚齐人社会的大部分人之间制造了深刻的和最后是血腥的分歧。<sup>①</sup>这种分歧一直影响到亚齐日后产生的民族分离主义。在缅甸,英国殖民者针对缅甸境内多民族和民族关系紧张的特点,有意识、有目的地推行了“分而治之”的政策,把缅甸分为缅族居住的缅甸本土和少数民族居住的山区两部分,对缅族和少数民族采取不同的政策,从而加深了各民族间的矛盾和对立。这一政策维护和巩固了英国人在缅甸的殖民统治,但却极大地有害于缅甸独立以后各民族间关系的发展。<sup>②</sup>

在西方殖民者的殖民政策中,宗教文化侵略也是其重要的内容。如荷属东印度公司在香料群岛传播新教,西班牙殖民者在菲律宾推广天主教,英国人在缅甸克伦族中传播基督教,从而导致了东南亚地区不同族群间宗教信仰和文化上的对立。在印尼,传统穆斯林与接受荷兰文教育的爪哇贵族的对立,在菲律宾,南部穆斯林与中北部信奉天主教的他加禄人数百年的对立,都与西方殖民者的

① [澳]梅·加·李克莱弗斯:《印度尼西亚史》,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201~202页。

② 参见李一平:《英国对缅甸殖民政策》,载《世界历史》1994年第4期。

宗教文化侵略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二)地理和经济上的特殊性——“中心”与“边缘”的关系,埋下了民族分离主义运动的祸根。

印度尼西亚地域辽阔而分散,号称“千岛之国”,属于地缘政治学上的“破碎地带”。印尼地理的特殊性使这个国家内部形成了中心与外围的特殊关系,爪哇岛高度集中了千岛之国的财富、人口和权力,而广大的外岛地区则正相反。爪哇岛上有 6 个行政区,而印尼其余的 21 个行政区都在外岛地区。爪哇岛集中了印尼 60% 左右的人口,但中央政府财政收入的大部分来自外岛。这种破碎、分散的地理形势不利于各地区间的联系和中央政府实行有效的管理,成为民族分离主义运动产生的温床<sup>①</sup>。此外,作为人类学家眼中的“人种博物馆”,印度尼西亚拥有多达 300 个以上操不同语言、信仰不同宗教和属于不同文化类型的民族(以爪哇人为主导)。民族与文化的多样性使得在印尼难以形成一个统一的民族认同,相反倒是易于诱发民族间的对立与分离。

根据依附论和世界体系的理论,在一个发展中的地区共同体内,某些地带先发展起来,形成发展的“中心”(core);后发展地带成为“边缘”(periphery),居于“中心”的是特权民族,居于“边缘”的是从属民族。“边缘”从属于“中心”,受“中心”剥削。为改变这种关系,“边缘”在某些特定条件下,以地方主义来对抗“中心”,而这些条件若带有特殊的文化与历史背景,就易于发展成一种“地区(民族)分离主义”意识。整个过程的本质是后发展地带欲摆脱从属地位,变“边缘”为“中心”。在某种意义上,印尼是个以爪哇岛或者雅加达为中心的帝国<sup>②</sup>。以 70 年代中期为界,70 年代中期以来,处于“边缘”地位的亚齐,由于有丰富的石油、天然气和金矿资源,使得亚齐很快成

为印度尼西亚最富裕的地区。仅号称世界上最大的天然气田之一的亚伦气田,每年可为印尼中央政府带来约 400 万美元的收入。但是中央政府拿走了亚齐绝大部分的收入,亚齐地方政府只得到了利润的 5%,当地人民的生活水平多年来都没有得到提高,人均收入属于印尼各地区的最低层次。亚齐受到了中央政府的残酷剥削,亚齐人认为爪哇人是新的殖民者。“印度尼西亚这个名词是可笑的,它是荷属东印度公司的别名,只不过是爪哇人取代了荷兰人。”<sup>③</sup>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亚齐的民族分离主义运动更以复兴伊斯兰教、争取和保障自身的经济利益为主,谋求建立独立的伊斯兰国家。

此外,在印度尼西亚的西伊里安查亚、马鲁古,泰国的南部,菲律宾的棉兰老岛等地区,都是因为存在着这样一种“中心”与“边缘”的关系,存在着诸多如民族分离问题的土壤。

(三)全球化浪潮的挑战与冲击,形成了全球化与民族分离主义思潮的互动。

“全球化是一种观念,通过源自西方的技术、商业与文化的同时扩散,使得世界逐渐地趋于一致和标准化,而与现代性联系在一起。”<sup>④</sup>吉登斯认为,全球化“意味着以全世界为范围的社会关系之增强。它连接相距遥远的异地,同时在此情况下,地方上所发生的事情会被远方所发生的事情所复制,反之亦

<sup>①</sup> 参见王满:《东南亚民族分离主义中的地缘因素》,载《东南亚》2000年第 3~4 期。

<sup>②</sup> See Michael van Langenberg, “Jakarta Empire faces structural change”, Jakarta, *Indonesian Observer*, September 11, 2000.

<sup>③</sup> “Giving No Quarter”,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July 29, 1999.

<sup>④</sup> Jan N. Pieterse, *Globalization as Hybridization*, in M. Featherstone, S. Lash and R. Robertson (eds), *Global Modernities*, London, Sage, 1995, p. 45.

然。<sup>①</sup>全球化表达了一种民族国家对“整个世界的总问题”或“人类的困境”的关注。从国际政治的角度来看,全球化的意义尤其在于它是对传统的国际关系、国家主权及其他权利、以国界标示人群活动范围的一种深入、持久的挑战。从文化理念来看,经济全球化由于知识经济、信息革命而得到迅猛的发展,导致了改变民族国家观念的“全球主义”思想的形成<sup>②</sup>。

全球化在 20 世纪末发展到了高峰,它使西方的意识形态得以推广,也激起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强烈抵制。“全球化推动经济一体化、地区一体化,但是文化的融合极其困难。不同民族国家充满了摩擦和冲突,不同的意识形态、文化传统、价值取向、民族精神、宗教传统、生活方式的存在使民族主义进一步凸现。”<sup>③</sup>全球化还削弱了国家维护统一的传统作用,人民的社会生活也逐渐被社会关系、网络信息以及文化影响的“全球化”所占领,各种宗教和种族—文化组织不愿消失其个性,并努力试图从其所在的国家中分离出来。美国学者马克·于尔根斯迈尔说:“中央集权被削弱了,新的分裂和种族活动也就开始了。”<sup>④</sup>

(四)民族国家在民族政策上的偏差和失误,直接或间接强化了东南亚地区的民族分离主义。

民族分离主义运动“不仅是表达对国家资源分配不均的不满,而且是对中央与地方关系处置不公正的反应”<sup>⑤</sup>。民族国家在建构国家社会经济的过程中首要考虑的问题之一,就是如何把分散的族群认同整合为国家认同。印尼建国初期,苏加诺政府从尊重印尼宗教与族群多样性的现实出发,提出“在多样性下的团结”这个基本原则来处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而到了苏哈托“新秩序”时期,苏哈托用所谓“一致性方式”解释“在多样性下的团结”,以对付宗教与族群冲突以及日益增

长的独立诉求。由于“一致性方式”忽视了差异性(认为印尼已经是一个民族,使用一种语言),所以地方(尤其是外岛)的利益被严重忽视,苏哈托政府精英治国的理念与文化被强行当作了全民文化。

在印尼的政治生活中,爪哇岛和爪哇人一直位居中心,中央政府在文化、教育方面实行同化政策,在分配国家政治资源时,爪哇人总是得到优先考虑,而外岛人则处于一种劣势地位。特别是在一些重要的组织和机构里,爪哇人更是占有绝对优势。如在印尼议会中,苏加诺统治时期,爪哇人占 53%;在苏哈托统治时期,爪哇人占 60% 以上。在苏哈托“新秩序”初期的军队高级将领中,爪哇人的比例占 66%,1977 年上升到 74%,1978 年更达到 80%,并且在外岛的军区司令中有 14%~15% 是爪哇人<sup>⑥</sup>。对此,有评论家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央政府一定要放弃国家团结的幻想而开始给地方政府以真正的自治。若不想看到这个国家解体的话,政府就不能采取半心半意的措施。为遏制全面的分离,自治的最终形式应是联邦主义。不管如何,国家解体的真正威胁来自雅加达。”<sup>⑦</sup>

在菲律宾,独立后的民族政策仍然带有殖民主义的痕迹,试图把少数民族的社会文化、政治经济等整合到以天主教文化为核心的菲律宾主流文化中。政府宣布他加禄语为

① Anthony Giddens, *The Consequences of Modernit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0, p. 664.

② 俞可平、黄卫平主编:《全球化的悖论》,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246 页。

③ 同上书,第 250 页。

④ 马克·于尔根斯迈尔:《民族主义爆炸》,转引自《参考消息》2000 年 2 月 16 日。

⑤ Elizabeth Morrell, *Strengthening the Local in National Reform: A cultural Approach to Political Change*,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No. 3, October 2001, p. 438.

⑥ David Brown, *The State and Ethnic Politics in Southeast Asia*, Routledge, 1994, pp. 128-129.

⑦ See Editorial, *The Jakarta Post*, November 10, 1999.

官方语言,在南部穆斯林地区大量兴办公立学校,推行英语教育,宣扬天主教文化,然而不但没有获得原住民的支持,反而遭到许多穆斯林的抵制<sup>①</sup>。

欲速则不达,民族政策上的偏差,引发或加剧了民族分离主义。为解决这个烫手的山芋,印尼新的民选政府正在进行广泛的讨论,并且着手推行新的地方自治。

## 印尼民族分离主义运动的未来

在全球化的浪潮中,全球化和地区分裂成为后冷战时代世界发展的主要趋势<sup>②</sup>。环顾东南亚地区,有的国家在按既定目标顺利发展,有的国家正陷入失序与混乱,在有序与无序的交织中痛苦地挣扎。印尼民族分离主义运动的未来会怎样呢?

如前所述,印尼民族分离主义运动的发展有着复杂的原因,最根本的还在于不同地区和不同民族之间在“中心”与“边缘”关系上存在着巨大的社会经济差异与不均衡性。在“民主化”的第三波中,外岛各省的民族分离倾向和分离运动可能还将继续发展。但必须注意到,在目前表现出的这种“分离主义”,更多的是“边缘”对“中心”的合理惩罚与矫枉过正,本质上是处于“边缘”的外岛地区为了在未来印尼中央与地方的经济、政治权力资源的调整中获得更大的利益。自从苏哈托的中央集权主义的专制统治垮台以后,印尼的民选政府得到了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支持。由于苏联和南斯拉夫解体带来的动荡、难民潮和巨额援助需求的压力以及印尼位居重要战略通道的地位等等,使得周边国家与国际社会都将继续支持印尼维持其国家团结与领土完整。因此,在可预见的将来,实施更大程度上的地方自治,仍将是印度尼西亚处理民族分离主义运动的较明智选择。

同时,印尼政治中逐渐增加的伊斯兰因素,正在引起东盟和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伊斯兰教的复兴和恐怖主义活动蔓延是当代世界的一大特征,印尼与东南亚也未能免俗。在某种意义上,宗教势力的出现也许是对政治腐败、社会不公、国家权力结构的一种补充。从印尼的政治发展来看,印尼的历届政府都反对政教合一,目前的民族主义政党和穆斯林政党都支持民主政治,印尼政治中的宗教因素尚不足以构成对印尼和东南亚地区民主政治发展的威胁。作为一种政治现象,印尼政治中的伊斯兰因素、恐怖主义活动仍将存在。但是,由于印尼的政治文化传统、民主政治发展的需要和国际社会(包括反恐怖主义力量)的强大压力,它们终将难成气候。

此外,在东南亚地区,局部冲突仍将是民族分离主义的重要表现形式。这种冲突分为两种,“一种是表面化的冲突,另一种则是目前尚未表面化的潜在冲突”<sup>③</sup>。前者如印尼的亚齐问题,后者如泰国南部的马来族问题。因为作为尚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大多数东南亚国家,“发展模式尚未定型,社会局势动荡不安,民族、种族、部族、地区之间以及国与国之间,因历史上的纠葛和现实利益的不同,由于协调机制的不够健全或领导层决策的失误或外来因素的干涉而导致冲突”<sup>④</sup>。但是,就印度尼西亚而言,作为对整个东南亚有着举足轻重影响的大国,它的稳定与发展,决定着未来东南亚地区的成功与繁荣。

<sup>①</sup> Peter G. Gowing, *Muslim Filipinos: Heritage and Horizon*, Quezon City, New Day Publisher, 1979, p. 210.

<sup>②</sup> 何平:《当代世界历史发展的新动向》,载《世界历史》2001年第 2期。

<sup>③</sup> 张蕴岭:《欧洲剧变与世界格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9年版,第 69页。

<sup>④</sup> 程人乾:《论近代以来的世界民族主义》,载《历史研究》1996年第 1期。